

跨越百年的對話

李 怡・魏美玲 主編

——2011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序】跨越百年的對話 / 李 怡

締造下一個百年華文文學盛世 / 須文蔚

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

——談新文學討論中國文學的「民國」意義

詞語的命運——現代中國的「文學」定義

左右同源——新文學史上的新寫實主義

青年、必讀、書與新文化

——魯迅《青年必讀書》中隱含的問題

張資平長篇小說接受研究的三個關鍵詞

生存慾求與死亡界限

——論劉恆的農民生活支柱小說

香椿樹街的文革往事與身體書寫

——以蘇童〈刺青時代〉、《城北地帶》為例

韓少功《山南水北》的鄉土世界

論兒童傳記的傳主選擇

物件、影像、家族史

——當代台灣女性敘事中的物件書寫與身分認同

少數文學與數位書寫的建構及共構

——以戰後迄今台灣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為探討範疇

臺灣原住民族女性書寫中的族群民俗傳統

尋找安居地

——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中的離／返敘事

李 怡

馬 睿

姜 飛

周維東

陳思廣

宋如珊

石曉楓

魏美玲

廖卓成

黃宗潔

魏貽君

劉秀美

楊 翠

跨越百年的對話

李 怡・魏美玲 主編

——2011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序】跨越百年的對話 / 李 怡

締造下一個百年華文文學盛世 / 須文蔚

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

——我們怎樣討論中國文學的「民國」意義

李 怡

詞語的命運——現代中國的「文學」定義

馬 睿

左右同源——新文學史上的新寫實主義

姜 飛

青年、必讀、書與新文化

——魯迅《青年必讀書》中隱含的問題

周維東

張資平長篇小說接受研究的三個關鍵詞

陳思廣

生存慾求與死亡界限

——論劉恆的農民生活支柱小說

宋如珊

香椿樹街的文革往事與身體書寫

——以蘇童〈刺青時代〉、《城北地帶》為例

石曉楓

韓少功《山南水北》的鄉土世界

魏美玲

論兒童傳記的傳主選擇

廖卓成

物件、影像、家族史

——當代台灣女性敘事中的物件書寫與身分認同

黃宗潔

少數文學與數位書寫的建構及共構

——以戰後迄今台灣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為探討範疇

魏貽君

臺灣原住民族女性書寫中的族群民俗傳統

劉秀美

尋找安居地

——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中的離／返敘事

楊 翠

跨越百年的對話

——2011 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出版單位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贊助單位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辦單位 /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主 編 / 李 怡 魏美玲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製作發行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2011 年 6 月 BOD 一版

定價：42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跨越百年的對話

李 怡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二〇一一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年份，不僅有辛亥革命的百年紀念，有民國歷史的百年典藏，更是中華文學的一個新的時間記憶點——誰也不能否認百年國體、政體的流變之於文學的重大意義。

海峽兩岸都在紀念這樣的「百年」，4月16日至17日，由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臺灣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臺灣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共同主辦的「海峽兩岸百年中華文學發展演變研討會」也在春意盎然的成都拉開了帷幕，出席者包括來自大陸和臺灣的四十餘位專家和學者，「百年」成為與會者勾勒中華現代文學發展演變的基本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人在本次會議上鄭重提出了中華民國歷史的特殊價值，並嘗試用「中華民國文學史」或「民國機制」等概念重新解釋現代中華文學，甚至從根本上取代由來已久的「新文學」、「現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基本用語。概念總是服務於每一次新的歷史敘述的需要，圍繞「中華民國」的文學敘述既是為了展開一段被人忽略的歷史內容，又體現了我們對其中的精神財富的某種緬懷和追溯，跨入新世紀的華人學界，是否應當重視這樣的歷史文化遺產，並引為自我反思的一種方式呢？

與大陸學人的歷史緬懷形成有趣對照的是，臺灣學人似乎更注意對當下的文學現象的解釋和剖析，當然，這些現象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大陸當代文學創作與臺灣當代文學創作。前者展示了臺灣學人跨越社會文化距離的努力，後者則屬於自我的追問和觀看。在這兩個方面，臺灣學人都表現出了很好的文學鑒賞與文本解讀能力，給與會者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由此也引出了四川大學青年學人姜飛先生的感慨：我們，為什麼就是我們如此的充滿政治的焦慮？在什麼時候，又是因為什麼使得我們失去的文學鑒賞的平靜和閒適？姜飛先生的感慨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當今兩岸學術姿態的某些差異，顯然，大陸的焦慮有它必然的理由，而臺灣的從容平靜也有其理所當然的原因，畢竟，兩岸所走過的現代歷史是如此的不同，同樣來到新世紀今天的我們，本來卻擁有各自的人生經驗與社會關懷！但正如中國社科院張中良教授在學術總結中所指出的那樣，差異本身也提供了一種彼此觀察、相互借鑒的可能。

面對差異又尋求溝通，這就是彼此渴望的對話。雖然這裏的對話並不那麼容易，在種種的話語隔膜，種種的文化斷層之外，我們究竟站在了同樣的歷史瞬間，面對共同的偉大傳統，「跨越百年的對話」成為我們相互理解、彼此欣賞的基礎，我們相信這樣的未來：更多的大陸學人將臺灣的當下文學（包括原住民文學）納入自己視野，而更多的臺灣學人亦能回應大陸學界的歷史情懷，分享曾經的文化經驗，那麼，對話就不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令人倍感溫馨和幸福的。

2011 年 6 月 9 日於北京

締造下一個百年華文文學盛世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今年是民國一百年，是中國人擺脫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重要紀念年代，「海峽兩岸百年中華文學發展演變研討會」在四川大學舉辦，可以說別具深意。因為在川大所在的成都，座落有詩聖杜甫的草堂，向來是文人墨客要來瞻仰的「聖地」。台灣詩人大荒就曾吟唱過：

家事國事全然不似寫詩那樣由你經營……

你實在很迂很天真

僅僅聽見劍外一記輕雷

便喜孜孜的相信春回大地

——大荒〈謁杜甫草堂〉

讀大荒的詩，品味研討會中眾聲喧嘩的論文，耳邊響起詩人的提醒：語言是我們的居所，是一間草堂，文學讓我們安住、自在，甚至可以天真，可以浪漫。

詩人更像時代的醫師，可以診斷出社會的病症。過去一百年中，不少作家歷經了戰亂、流離、倉皇的歲月，無數傑出的文學作品，記錄了人們實際的生活，或是苦悶的內心。無論是作家或評論家，鮮少不受到政治、社會或經濟環境的變遷，因而鼓盪思想與文字，但經歷了百年歷史的沈澱，或許是到了可以和緩、縝密與冷靜分析文學作品的時刻。

「海峽兩岸百年中華文學發展演變研討會」固然要回顧一百年間，華文文學發展的風貌，更重要是，藉由兩岸的學者交流，展向未來一百年，華文文學工作者營造一間語言的屋宇，建構自己的美學、世界觀、批評系統。杜甫有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正說明了我們齊聚於四川大學，有著和杜工部同樣的盼望，更有著向世界證明華文文學獨特與優美的志向。

本次研討會中，論文主題涉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地的文學作品，更包括了西南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討論。可見在華文文學的大家族中，雖然分居海內、外，雖然深處不同的政治體制下，但是運用華文書寫，傳承華文文學香火的想望與實踐，沒有一

刻稍歇。有待更多的研究者，開闊視野，不以自身所處的區域為限，則華文文學研究自然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名作家痲弦說過：「文學貴在個性，卻又要以創意建構聯合，形成文學社群，聯合不是無意見的凝結，而是眾聲喧講；不是文學思想或創作路線一致化，更不是強調群性，壓抑個性。」在這次研討會中，我們聆聽到不同文學觀念的辯證，由於相互尊重，兼容並蓄，更使得研討的結果顯得意義非凡。

感謝主辦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嚴謹組織會議，李怡教授的盛情款待。更要感謝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理事宋如珊，以及本系劉秀美老師的縝密聯繫。你們的努力，讓所有與會者相信：締造下一個百年華文文學盛世，指日可待。

目次

序一：跨越百年的對話	李 怡	i
序二：締造下一個百年華文文學盛世	須文蔚	iii
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		
——我們怎樣討論中國文學的「民國」意義	李 怡	1
詞語的命運		
——現代中國的「文學」定義	馬 睿	11
左右同源		
——新文學史上的新寫實主義	姜 飛	25
青年、必讀、書與新文化		
——魯迅《青年必讀書》中隱含的問題	周維東	39
張資平長篇小說接受研究的三個關鍵詞	陳思廣	49
生存慾求與死亡界限		
——論劉恆的農民生活支柱小說	宋如珊	59
香椿樹街的文革往事與身體書寫		
——以蘇童〈刺青時代〉、《城北地帶》為例	石曉楓	75
韓少功《山南水北》的鄉土世界	魏美玲	95
論兒童傳記的傳主選擇	廖卓成	109
物件、影像、家族史		
——當代台灣女性敘事中的物件書寫與身分認同	黃宗潔	121
少數文學與數位書寫的建構及共構		
——以戰後迄今台灣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為探討範疇	魏貽君	133
臺灣原住民族女性書寫中的族群民俗傳統	劉秀美	169
尋找安居地		
——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中的離／返敘事	楊 翠	181

編後記

201

附錄：會議發表人及發表論文

203

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 ——我們怎樣討論中國文學的「民國」意義

李 怡^{*}

摘要

中國現代史上的「中華民國」是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環節，以「民國」為敘述框架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成為我們的自覺追求。其中，探討「民國文學機制」更是我們亟待解決的課題，所謂「民國文學機制」，指的就是從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專制政權——清王朝覆滅以後，新的社會形態（民國）中逐步形成的影響和推動文學新發展的種種的力量。

關鍵詞：中華民國、民國文學機制、中國現代文學

^{*} 李怡：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From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Naming to Excavating the Cultural Mechanism —How to Inquire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Literature

Li Yi^{*}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China.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by tak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narration frame should become our conscious pursuit. To explore the literature mechanis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ubject urgent to be solved. The literature mechanis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fers to the gradually formed influence after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last feudal autocratic regime's collapse, and all sorts of strengths that give an impetus to the fresh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social form,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iterature mechanis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 Li Yi: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前言

中國現代史上的「中華民國」是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環節，無論是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歷史標誌，還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曾為「民國」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奮鬥犧牲的重要事實，「民國」之於現代中國的意義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深究的。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而言，其特殊的敘史意義可能更引人注目。

中國現代文學的「敘史」一直都在不斷修正自己的框架結構，從一開始的「新文學」、「現代文學」到 1980 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每一種命名的背後都有顯而易見的歷史合理性，但同時又都不可避免地產生難以完全解決的問題。「新文學」在特定的歷史年代劃開了與傳統文學樣式的距離，但「新」的命名畢竟如此的感性，終究缺乏更理性的論證；「現代文學」確立了「現代」的價值指向，問題是「現代」已經成了多種文化爭相解釋、共同分享的概念，中國之「現代」究竟為何物，實在不容易說清楚；「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確立的是百年來中國文學的自主性，但是這樣以「世紀」紀年為基礎的時間概念能否清晰呈現這一文學自主的含義呢？人們依然不無疑問。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上，關於中國現代文學「敘史」的「民國」定位被提了出來，形成了越來越多的「民國文學史」命名的呼籲。

一

1999 年，陳福康借助史學界的概念，建議中國文學的現代／當代之名不妨「退休」，代之以中華民國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之謂；¹2003 年，較早發出「民國文學」呼籲的張福貴先生認為，以「民國文學」取代「現代文學」意在「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在他看來，「現代文學」的概念過分突出了對歷史意義的認定而使得我們的歷史敘述出現了較多的傾向性和排他性，理想的文學史定位似乎是：「文學史的命名，不同於文學評論，也不同於文學史本身，應該獲得最大限度的認同。從這一點來說，作為一種存在事實的陳述，文學史因為儘量淡化命名的傾向性，而突出中間性。時間概念又具有中間性，不包含思想傾向，沒有主觀性，不限定任何的意義評價，只為研究者提供一個研究的時空的邊界。」²隨後魏朝勇試圖在「現代中國文學」這一統稱之下，具體分解「民國時期文學」與「共和國時期文學」，從而賦予「現代」以確切的歷史內涵；³最近幾年，這一訴求開

¹ 陳福康：《應該「退休」的學科名稱》，見《民國文壇初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年），第 10 頁。

² 張福貴《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問題》，香港《文學世紀》2003 年 4 期。

³ 魏朝勇：《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像》，（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5 年），第 12 頁。

始進一步發酵，秦弓等提醒大家注意民國歷史的場域對於現代文學闡釋的重要價值，⁴湯溢澤等呼籲正視文學的政治基礎：「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的歷史單位，相應的文學史——『民國文學史』也有存在的合理性。」⁵趙步陽等從文化遺產保存的角度闡述了「民國文學史」的特殊意義，⁶筆者也曾提出，「民國文學史」框架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諸如「大後方文學」等的真實形態。⁷

從我們熟悉的「新文學」、「現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新的「民國文學」，新的歷史命名究竟可能在什麼方向上推動我們文學史的研究呢？顯然，是要通過對更多歷史細節的「還原」呈現文學過程的豐富性，擺脫從某一既定概念出發形成的史實遮蔽。鑒於當前的命名願望是如此的不容妥協——幾乎將固有的現代文學概念通通置於被審判的地位，也鑒於此番歷史的重寫是那麼的氣象宏大——力圖重新接續中國文學史固有的斷代模式並重建中國自己的文學敘述方式，我們可以認為，當前出現的新的命名的努力可以說是繼 1980 年代中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之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標誌性意義的學術追求，它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推動效應在不久的未來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一種新的學術思想的範式正在快速地醞釀和發展著。

二

當然，任何研究範式的創立和改變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必須要對固有的思想方式進行證偽，而過去的思想範式在對歷史的有效解釋之中卻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理據相連、推理周密的邏輯鏈條，要尋找縫隙擊碎這些鏈條，其承受的阻力可想而知，有時候，挑戰所遭遇的能量反轉甚至可能動搖我們的理論基點，令對他者的質疑首先陷入到自我質疑的困境。這是我們新的歷史建構不得不正視的事實。

在我看來，「民國文學史」的命名不必刻意強化我們與其他歷史命名的尖銳對立，更不能將彼此的分歧誇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因為，那樣一來，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徹底顛覆一系列基本文學稱謂的敘述尷尬之中：新文學、現代文學以及已經有了二十多年歷史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它們既是研究者的學術命名，同時也不斷成為文學當事人自

⁴ 秦弓先後發表《從民國史的角度看魯迅》（《廣東社會科學》2006 年 4 期）、《現代文學的歷史還原與民國史視角》（《湖南社會科學》2010 年 1 期）。

⁵ 湯溢澤、廖廣莉：《論開展「民國文學史」研究的迫切性》（《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期）另有湯溢澤：《以「民國文學史」替代「新文學史」考》（《湖南社會科學》2010 年 1 期）、湯溢澤、郭彥妮：《論開展「民國文學史」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0 年 2 卷 3 期）。

⁶ 趙步陽、曹千里等：《「現代文學」，還是「民國文學」？》（《金陵科技學院學報》2008 年 1 期），張維亞、趙步陽等：《民國文學遺產旅遊開發研究》（《商業經濟》2008 年 9 期），類似論文還包括梁子民、畢文昌《學術史分期的當代意義》（《中國青年報》2006 年 12 月 6 日）、楊丹丹《「現代文學史」命名的追問與反思》（《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5 期）等。

⁷ 李怡：《「民國文學史」框架與「大後方文學」》，《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09 年 1 期。

我認同、自我展開的某種方式，要從一切的敘述領域乃至思想領域中徹底「清除」，事實上已無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我們最終尋求的主要是解釋歷史的一種更合理的間架結構，而不是改變歷史當事人本身의思想和語言習慣，甚至，也不必因此取消其他歷史概念敘述者的價值。既然新的以回歸民國社會歷史為追求的研究是為了更豐富地呈現細節，那麼我們所發現的細節就不是以否定和排斥過去歷史敘述的細節為目標，今天的新發現的歷史細節本來就與過去的細節相互補充；我們也不必一味在研究模式的獨特性方面與過去一較短長，過去關於現代文學的各種判斷、分析和追求也可以融入今天的研究。例如，為了強調新研究的獨特性，我們一般都反覆說明「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的價值，突出「民國文學」框架的宏富性：「這樣『現代文學』就成了單純的時間概念，成為可以包羅萬象的時間容器，即可以接納五四新文學，又可以包容以鴛鴦蝴蝶派為主要特徵的舊派文學，同時也不遮蔽言情、偵探、武俠之類的舊通俗文學，舊派文學的詩詞格律、日偽淪陷區的漢奸文學、日常生活文學都可以在『民國文學』的時間框架下找到存在的位置，而不致以遭受被放逐的命運。」⁸然而，是否真的存在這麼一種歷史敘述模式：沒有思想傾向，沒有主觀性，可以包羅萬象？甚至我們還會追問：需要有包羅萬象的文學史嗎？

韋勒克、沃倫闡述過一個重要的觀點：文學史的時代命名並不是隨意的標籤張貼：「不能同意認為文學時代只是一個為描述任何一段時間過程而使用的語言符號的那種極端唯名論觀點。極端唯名論假定，時代的概念是把一個任意的附加物加在了一堆材料上，而這材料實際上只是一個連續的無一定方向的流而已；這樣，擺在我們面前的就一方面是具體事件的一片渾沌，另一方面是純粹的主觀的標籤。如果我們持這樣的觀點，那就意味著我們在變化多端但本質上一致的現實中的不管哪個地方截取一個橫斷面都明顯地是無所謂的。從而，我們不管採用什麼樣的文學分期系統，即使這種分期系統是多麼任意和機械，也都是無關緊要的了。」⁹「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較為近代的英國文學史，就會發現那種依據曆法上的世紀或國王統治時期來給文學分期的作法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不見，而代之以一系列的時代，這些時代至少在名稱上得自最多種多樣的人類精神活動的。雖然我們還依舊使用『伊莉莎白時代』的文學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這種殘存的、按不同王朝劃分時期的老式術語，但這些字眼已經在一個理智史的系統中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我們沿用它們，是因為我們覺得這兩個女王似乎象徵了她們那些時代的特徵。」⁹「這些術語原本是政治術語，現在卻在理智史甚至文學史中獲得了一種特定的意義。」⁹「文學上某一時期的歷史在於探索從一個規範體系到另一個規範體現的變化。」⁹

對於我們來說，「民國文學史」之所以有出現的必要，並不是它可以通過排除主觀思想傾向來容納一切，而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文學的新規範。「民國」作為以特定政治形態為基礎的歷史單位，最後能夠成為「文學」的定位之語，乃是按照我們的「理智」和「思

⁸ 楊丹丹《「現代文學史」命名的追問與反思》，《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5期。

⁹ （美國）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302、303、304、307頁。

想」判斷，它已經形成一種特定的規範文學的意義。換話說，它不僅是時間的概念，同樣也屬於意義的概念，那種不能為「新文學」、「現代文學」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表達的意義概念。至於舊體詩、通俗文學、漢奸文學等等能否進入「民國文學史」，也主要是看它們能否在新的文學規範的向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因為過去文學史的「放逐」就一定要被今天所「收容」。

在我看來，新的文學史研究在歷史概念的辯正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新的文化機制的發掘，因為正是在這些文化機制當中，包含著特定時期文學規範的重要資訊。

三

除了對「民國文學」的歷史概念深表認同之外，我以為探討「民國文學機制」是我們亟待解決的課題。

所謂「民國文學機制」，指的就是從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專制政權——清王朝覆滅以後，新的社會形態（民國）中逐步形成的影響和推動文學新發展的種種的力量，或者說，因為各種力量（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文化結構、精神心理氛圍等等）的因緣際會最終構成了對文學發展肯定，同時在另外的層面上也造就了某種有形無形的局限，這一時期的文學形態都可以在這樣的綜合性結構中獲得解釋，當然，未來文學形態的變化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歸結於這種「機制」的消亡，中國現代文學在民國時期種種形態的消亡，根本便在於新的文學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制的替代。

「民國文學機制」可以在不同方向和層面上加以解釋和挖掘。

例如民國經濟形態所造就的文學機制。從 1913 年張謇擔任農商務部總長，提出原則上撤廢公營事業、優先振興民間企業起，側重以民營資本為主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便開始建立，後來國民政府的經濟管理高層如陳公博、宋子文等均大力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反對強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抑制政府財政支出。其間雖有孔祥熙提出以化學工業為主導的國營企業發展計畫，有抗戰時期向計畫統治經濟的傾斜，但民營經濟發展的主導格局則基本確定。中國近現代的出版傳播業就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發展起來的，出版傳播業的民營性質雖然決定了文學的「市場利益驅動」，但讀者市場的驅動本身又具有多元化的可能性，較之於一元化思想控制的國家壟斷，這顯然更能為文學的自由發展提供較大的空間。

再如民國法制形態影響下的文學發展。

清末新政，預備立憲，中國自國家層面的「憲政」與「法治」構想便已經啟動，法學人才進入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從此成為大勢所趨，學習法律成為從事法律職業的必備之資格。民國以後，法學人才的培養更成為教育界之重任。綜合性大學的法科是學生人數最多的專業，北京大學在 1917 年到 1923 年的六年間，法科畢業生人數占該校年均畢

業生人數的 50%；而國內更有大量的法政專門學校，僅從 1912 年到 1925 年，全國有記載設立的法政專門學校有 418 所，各類專門學校共計 1143 所，法政專門學校占當時各類專門學校總數的 37%；法政學校的在校生人數，占到全國專門學校在校生總人數的 50% 以上。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法律職業集團的出現，這樣一個法律思想界別的形成都加強著民國社會的「法治」意識。我們看到，民國時期，立法上的重大舉措都有法學家們的思想參與，針對民國時期立憲過程中不顧國情的情況，對於立法過程中的「黨治」問題，當時的法學界就頗多批評，¹⁰獨立的「法學界」的輿論壓力對於民國法制形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些重要的法律在制定過程中，都首先由媒體公示，在法學家甚至社會公眾中展開充分的研討，如 1912 年《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1915 年《刑法修正案》、1919 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1935 年《中華民國刑法》的起草，法學界的表現都相當的踴躍。

至少在法制的表面形態上，民國政府表現出了一系列「法治」的努力。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雖然短暫，但卻創建了一系列的保障民權的法律法令，北洋政府時期雖然戰亂不息，但依然維持了民主法制的表面格局，到南京國民政府，則系統繼承了自清末修律以來的法制建設成就，逐漸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為主幹的所謂「六法體系」。民國法制形態對「民權」的保障與專制者的獨裁行政構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獨裁專制一方面致力於思想文化的控制，不斷踐踏保障民權的法律，但以「三民主義」和西方法治思想為基礎民國法律同樣也建構著保障民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哪怕它本身是如此的動搖和脆弱。

在民國時期，我們目睹了知識份子利用法律為武器，對抗專職獨裁、捍衛言論自由的大量案例。1922 年 10 月，北京各界發起要求廢止《治安警察條例》運動，1925 年，北京新聞界要求撤銷《管理新聞營業條例》運動，上海新聞界要求廢止《出版法》等法令，1932 年《申報》反禁郵，1933 年《生活》反封殺，1938 年，為抗議國民黨政府制定《出版法》、《新聞檢查標準》、《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由生活書店和其他書局等發起，各界人士的參加「拒檢運動」，即便在處於國家戰時緊急狀態，如《新華日報》也依然採用「開天窗」的形式公然對抗新聞檢查。來自知識階層的風起雲湧、層出不窮的抗議風潮，極大地反撥了國家政府的行政獨裁，令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等都不得不有所顧忌，當魯迅憑一己之力可以控告教育部勝訴，當段祺瑞也不得不承認「限制輿論的做法不適合共和國的國體，對輿論應先採取放任主義」之時，當汪精衛等狀告成舍我和《民生報》損害名譽卻又最後撤訴於法院，當蔣介石也不得不在一些禁令上有所妥協讓步，中國現代文學的自由空間顯然獲得了寶貴的維護。

民國教育制度的存在則為文學新生力量的成長創造了文化條件，也為廣大知識份子的生存提供了物質基礎。自晚清開始，中國教育逐步形成了國立、私立與教會教育的三足鼎

¹⁰ 有關情況可以參見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立之勢，¹¹在今天看來，這些教育大體上實踐了教育獨立、中西會通的原則，為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晚清中國教育先是接受了德日中央集權模式的影響，官辦學校成為教育的主體，然而這一政治與教育聯合的中國方式卻不斷遭遇到具有留洋背景的新知識群體的批判和抨擊，加之民國初年的政治動盪，中央政權實際上無法有效地將自己的政治理念貫穿到校園之中，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於1912年—1913年制訂頒佈的民國第一個學校制度系統（即「壬子癸丑學制」），其中的《大學令》、《大學規程》等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已經包含了若干廢除了忠君、尊孔等舊教育宗旨的內容，同時如校內設評議會、教授會等機構，則開始效仿英美大學的自治權和學術自由思想。「五四」時期在教育界更開展了廢止教育宗旨、宣佈教育本義、倡行教育獨立的運動，「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現代公民教育思想成為全國教育聯合會太原年會的決議。大學獨立的理念深入人心，即便軍閥辦大學，也不得不表現出對教育的相當敬重，或者借興辦教育博取自己的社會聲譽，國民黨努力推進「黨化教育」，也卻一直受到校內外各種力量的抵制和反對，徹底的「黨化教育」從來也沒有在民國實現過。正是這樣的教育環境為現代中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思想獨立、個性鮮明的青年知識份子，而又是這些知識份子的創造活動揭開了中國文學嶄新的一頁；當這些寫作者走出各級學校的大門，便成為勇於承擔社會道義的中堅，為民族憂思，為民眾吶喊，為理想奮鬥，而生存於校園的人們，也能夠利用相對優越的物質條件進行文化的融合與知識的反思，在不同階段接受過民國學校教育青年可能分別形成了社會派作家和學院派作家，他們興趣有別，優劣均在，但認真觀察，卻都自有其獨立的文學貢獻，奔波於底層社會的左翼革命文學同樣受惠於民國教育，1940年代的西南聯大作家群則利用高等教育的資源進行了獨特的文化與生命思考。現代中國文學由此而更加豐富和生動。

民國文化之於文學的「機制」性影響還體現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與人文性格。撫今思昔，特別是經歷過「階級鬥爭」年代的人們很容易為民國文化人的那樣一種溫厚、寬容、謙恭的氣質與性格而動容，「民國氣質」多少成為一個令人感歎和緬懷的概念。無論這裏面包含著幾多的誤會和想像，我們都應該承認，在沒有經過政治運動洗劫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西方文化的理念的確曾經發生過令人欣羨的共容，而不同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匯流並不是今天人們所臆想的那樣你死我活，針鋒相對，從「五四」開始，激進與保守，東方與西方，本土和外來，既彼此砥礪又並行發展，「五四文化圈」是豐富的、博大的，既沒有「打倒」傳統文化，沒有「否定」民族特色，更沒有「斷裂」文明的進程，它是不同品格的文化在現代文化的新的生態環境中都獲得了生機。¹²那種動輒指責新文化斷裂傳統文化的論調顯然來自「民國文化氣質」不復存在的時刻，其中反映的與其說是歷

¹¹ 到1948年，中國一共有56所大學，公立31所，私立13所，教會12所。

¹² 參見拙作：《誰的五四？——論「五四文化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3期）、《「五四」與現代文學「民國機制」的形成》（《鄭州大學學報》）2009年4期。